



杜亚泉先生年谱(1912—1933)

陈镜文,亢小玉,姚远

(西北大学 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 西北大学编辑出版与传播科学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目的 以时间为顺序,厘清晚清民初杜亚泉(1873—1933)在中国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的贡献,以及其所从事的教育活动。方法 采用文献分析和考证法。结果 从1898—1933年共36年间,杜亚泉自办2份期刊及创办亚泉学馆、普通学书室,先后在中西学堂、浚溪公学、越郡公学、速成小学师范讲习所、新中华学院等处授课,共发表文章320余篇,主编教材四五十部。结论 杜亚泉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经由日本引进西方科学,特别是近代化学的标志性人物,其科学传播实践及其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杜亚泉(1873—1933);西方自然科学;科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 K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4 (2008)06-1044-07

1912年

8月,在《东方杂志》9卷2号发表《论命令之性质及范围》、《外蒙古之宣布独立》、《清宫秘史(续)》。

9月,在《东方杂志》9卷3号发表《论省制及省官制》。

10月,在《东方杂志》9卷4号发表《论人民重视官吏之害》。

11月,在《东方杂志》9卷5号发表《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论切音字母》、《省制仿普鲁士州制之商榷》译文《日本明治时代之进步》(摘自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日本明治天皇大丧纪》、《独立命令论》。

12月,在《东方杂志》9卷6号发表《中国民国第一届国庆纪事》。

1913年

40岁,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普通学书室编印的历史教科书《普通新历史》,由商务印书馆增订出版,这本书出版后流传甚广。

所著教科书《植物学》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该年,杜氏发表于《东方杂志》的文章如下:

1月,《东方杂志》9卷7号,《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其上编中的《通论》和《下编》中的《财

政》、《实业》均为杜氏所作、《再论减政主义》。

2月,《东方杂志》9卷8号,《吾人将以何法治疗社会之疾病乎》、《独立后之库伦及俄蒙协约》。

3月,《东方杂志》9卷9号,《论中国之社会心理》。

4月,《东方杂志》9卷10号,《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

5月,《东方杂志》9卷11号,《现代文明之弱点》、《西康建省谈》(连载2期)。

6月,《东方杂志》9卷12号,《大借款之经过及其成立》。

7月,《东方杂志》10卷1号,《精神救国论》(连载3期)、《对于筹备巴拿马赛会之意见》。

9月,《东方杂志》10卷3号,《革命战争之经过及其失败》。

11月,《东方杂志》10卷5号,《国民今后之道德》。

12月,《东方杂志》10卷6号,《理性之势力》、《中俄关于蒙事协商之成立》。

1914年

41岁,7月,《学生杂志》创刊号发表杜亚泉署名“佗父”的《有脊动物国之大会议》一文。夏秋之际,欧战爆发。

收稿日期:2008-0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7XXW004);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科技期刊学基金资助项目(JY0603)

作者简介:陈镜文(1974—),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学报编辑,从事中国科技传播史研究。

通讯作者:姚远(1955—),男,陕西岐山人,西北大学编审,从事中国科技传播史研究。

该年,杜氏发表于《东方杂志》文章如下:

6月,《东方杂志》10卷 12号,《个人之改革》。

7月,《东方杂志》11卷 1号,《接续主义》。

8月,《东方杂志》11卷 2号,《欧洲大战争开始》、《策消极》。

9月,《东方杂志》11卷 3号,《大战争与中国》、《战争杂话》、《大战争续记》(连载 3期,及 12卷 1号,3号,5号,8号,10号,12号,13卷 3号,12号,14卷 7号)。

10月,《东方杂志》11卷 4号,《大战争之所感》。

11月,《东方杂志》11卷 5号,《破除享福之目的》。

1915年

42岁,杜亚泉所著的教科书《动物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年,杜氏发表于《东方杂志》的文章如下:

1月,《东方杂志》12卷 1号,《社会协力主义》。

2月,《东方杂志》12卷 2号,《自治之商榷》译文《欧美社会党之消息》(摘自日本及日本人杂志)、《日本众议院之解散》。

3月,《东方杂志》12卷 3号,《论思想战》。

4月,《东方杂志》12卷 4号,《差等法》、《国家自卫论》、《日本要求事件》、译文《德国般哈提将军主战论之概略》(连载 2期)、《戒早婚》、《度量》、《政争》。

5月,《东方杂志》12卷 5号,《波海会》、《战争与文学》、《哈克图会议之经过》、译文《日本选举运动之内幕》(节选自日本中央公论)、《商会》、《隐逸》。

6月,《东方杂志》12卷 6号,《国民对外方法之考案》、《国家意思之发表》、《产业组合》、《禁酒与禁烟》、《谈名利》、外交新剧《假亲王》(连载 3期)、译文《日人之开发中国富源论》(摘自日本太阳杂志)、《纪远东运动会》。

7月,《东方杂志》12卷 7号,《命运说》、《消极之兴业谈》、《日人对于中日交涉解决后之言论》、《职业智识》、《知事试验》、《国情之歧异》。

8月,《东方杂志》12卷 8号,《读色纳嘉幸福论书后》。

9月,《东方杂志》12卷 9号,《劝业委员会》、译文《德意志帝国主义之由来》(英国麦凯布著)。

10月,《东方杂志》12卷 10号,《吾人今后之自觉》、《欧战之感想》、《慈善事业》。

11月,《东方杂志》12卷 11号,《国民共同之概

念》。

12月,《东方杂志》12卷 12号,译文《俄国军队之缺点》(选自日本廿世纪杂志俄国某将校原著)。

1916年

43岁。6月,袁世凯称帝失败病逝后,撰写《帝制运动始末记》连载于《东方杂志》上,详细阐述了袁世凯帝制运动整个事件的过程。

1月,《东方杂志》13卷 1号,《英德海上对抗之大事》。

2月,《东方杂志》13卷 2号,译文《欧洲战乱与社会党》。

3月,《东方杂志》13卷 3号,《家庭与国家》、《从生物现象上观察之战争》、《保护宜昌石龙记》。

4月,《东方杂志》13卷 4号,《再论新旧思想之冲突》、译文《妇女参政权运动小史》(日本新公论转自伦敦发行之妇人参政年鉴)。

5月,《东方杂志》13卷 5号,《爱与争》、《论国音字母》、译文《回教徒其将蹶起乎》(来伊得博士著)。

6月,《东方杂志》13卷 6号,《力之调节》。

7月,《东方杂志》13卷 7号,《帝制运动始末记》(连载 4期)、《天意与民意》、《集权与分权》(连载 2期)。

9月,《东方杂志》13卷 9号,《论民主立宪之政治主义不适于现今之时势》、《梁任公先生之谈话》、译文《日本人之领土购买政策论》(日本文学博士建部遁吾)。

10月,《东方杂志》13卷 10号,《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予所期望于大总统者》。

11月,《东方杂志》13卷 11号,《中西验方新编》(陈汉翘著)。

1917年

44岁。1月,《东方杂志》14卷 1号,《中国人果惰乎》、《外交曝言》、《预言与暗示》、《男女及家庭》、《钢骨三合土建筑法述略》。

2月,《东方杂志》14卷 2号,《选举与考试》、《予之蔬菜主义及方法》。

3月,《东方杂志》14卷 3号,《个人与国家之界说》、《妇女职业》、《农村之娱乐》。

4月,《东方杂志》14卷 4号,《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家庭之改革》、《日本议会解散记》、译文《旅居暹罗之中国人》(摘自日本支那杂志)。

5月,《东方杂志》14卷 5号,《俄国大革命之经过》、《自由结婚》、《文明结婚》。

6月,《东方杂志》14卷 6号,《说俭》。

7月,《东方杂志》14卷 7号,《未来之世局》。

8月,《东方杂志》14卷 8号,《今后时局之觉悟》、《国会之解散》、《游场与公园》、《交友》、译文《运河政策》(摘自日本新公论杂志)。《普通新历史》由商务印书馆修订 28版。

9月,《东方杂志》14卷 9号,《真共和不能以武力求之论》、《宣战与时局之关系》、《国内调查》、《防盗》。

10月,《东方杂志》14卷 10号,《中国回教传衍之历史及各省回教之近况》。

11月,《东方杂志》14卷 11号,译文《美国之参战与战后之变动》(摘自日本太阳杂志)。

12月,《东方杂志》14卷 12号,《革命后之俄国近情》、译文《世界人之世界主义》(摘自日本外交时报)、《义勇农》、《战争时代多产男子之实据》、《最轻之金属与最轻之气体》、《力之经济》、《殖民》、《墓地》。

这一年中,杜亚泉写了为数不多的几篇关于自然科学的文章,即《钢骨三合土建筑法述略》和《最轻之金属与最轻之气体》。

1918年

45岁,2月,杜亚泉等 13人编著的《植物学大辞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 1 700多页 300万字,载植物名称术语 8 980条,西文学名术语 5 880条,日本假名标音植物名称 4 170余条,附植物图 1 002幅。蔡元培指出:“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详博无逾于此矣”^[11];祈天锡指出:“自有此书之作,吾人于中西植物之名,乃得有所依据,而奉为指南”^[12]。

该年,杜氏发表于《东方杂志》的文章如下:

1月,《东方杂志》15卷 1号,《推测中国社会将来之变迁》、《续记俄国之近状》、译文《劳动争议之解决办法》(摘自新日本杂志)、译文《英国之富源》(摘自日本及日本人杂志)。

2月,《东方杂志》15卷 2号,《矛盾之调和》、《政治上纷扰之原因》、译文《论移民海外之利害》(摘自新日本杂志)。

3月,《东方杂志》15卷 3号,《死之哲学》、《中国农田收获量与德国之比较》、译文《北美合众国之人口状态》(日本外交时报转自美国某博士原著)。

4月,《东方杂志》15卷 4号,《迷乱之现代人心》、《工艺杂志序》、译文《印度之宗教》(摘自日本及日本人杂志)、译文《日本之对华政策及两国之关系》(美国传教士伯修福特著)。

5月,《东方杂志》15卷 5号,《金权与兵权》、译文《中国财政之观察》(日本法学博士堀江归一著)。

6月,《东方杂志》15卷 6号,译文《论中日提携》(摘自日本中央公论)、译文《美索波太迷亚之英德关系》(摘自日本外交时报)。

7月,《东方杂志》15卷 7号,《中国之新生命》、译文《山东之苦力》(摘自日本时论)、译文《罗马灭亡之经济考察》(摘自日本国民经济杂志)。

8月,《东方杂志》15卷 8号,《国家主义之考虑》、《劳动主义》、《国文典式例》。

9月,《东方杂志》15卷 9号,《欧战延长之原因及与我国之关系》、译文《去年中国铁路之概况》(摘自日本亚细亚时论)、译文《西伯利亚事情》(摘自日本亚细亚时论)。

10月,《东方杂志》15卷 10号,《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教育之指导》、《迷误之告文》、译文《蒙满经济大要》(摘自日本实业之世界)、译文《日本米风潮中之日人言论》(摘自日本及日本人杂志)。

11月,《东方杂志》15卷 11号,《侨居都市者对于乡里之责任》、《族葬》、译文《新亚细亚主义》(摘自日本太阳杂志浮田和民著)、译文《战后之美国移民问题》(摘自东方时论)。

12月,《东方杂志》15卷 12号,《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答 新青年 杂志记者之质问》、译文《欧洲大战与中国历史之比较》(摘自日本东方时论)。

1919年

46岁,所著初中教科书《自然科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6卷 2号刊登《再质问东方杂志 记者》,文中反问杜亚泉此前回应的文明统整说,杜亚泉这次未再回应。至此,陈独秀和杜亚泉之间的关于东西文化论战暂告一段落。

“五四”后,当时的社会思想潮流是激进的,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坚持理性的调和论思想与这种时代背景就显得格格不入了,商务印书馆当局考虑到官方的营业及其社会影响,于年底,免去杜亚泉《东方杂志》主编。

该年,杜氏发表于《东方杂志》的文章如下:

1月,《东方杂志》16卷 1号,《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译文《中国之内国关税》。

2月,《东方杂志》16卷 2号,《欧战后中国所得之利益》、译文《高加索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3月,《东方杂志》16卷 3号,译文《中国之糖业》。

4月,《东方杂志》16卷 4号,《中国政治革命不

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译文《德意志屈服之原因》。

5月,《东方杂志》16卷 6号,《中国兴业之先决问题》,译文《太平洋之将来与列强之贸易战》。

6月,《东方杂志》16卷 6号,译文《中等阶级论》,译文《中国之电话事业》。

7月,《东方杂志》16卷 7号,译文《美人及美国论》,译文《人种差别之意义》。

8月,《东方杂志》16卷 8号,译文《历史上之世界支配者》,译文《美国之政治组织》(连载两期)。

9月,《东方杂志》16卷 9号,《新旧思想之折衷》,译文《国际联盟之成立与日英同盟之将来》。

10月,《东方杂志》16卷 10号,《职业之高下》、《奸商与死刑》、《世界经济状况之变迁》、《智识阶级之团结》,译文《国际法上之保护领》(连载 2期)。

11月,《东方杂志》16卷 11号,《何谓新思想》,译文《共济组合论》。

12月,《东方杂志》16卷 12号,《论通俗文》。

1920年

47岁,2月,《东方杂志》17卷 2号转载了蒋梦麟的文章《何谓新思想》,杜亚泉在文后对其作了评论,针对蒋的“新思想是一个态度”的观点,杜亚泉不改其一贯主张,仍坚持用理性支配思想。

11月,针对余云岫在《学艺》2卷 4号上的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在该刊二卷八号发表了《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反驳了余文的观点。余认为在科学的时代,中医的阴阳五行说是不符合事实、没有根据的,应当坚决摒弃,而杜氏认为中西医应结合互补,“总之人类微妙的生理,只有人类微妙的心灵,可以觉着它。医学的初步,虽然靠着机械的试验;医学的大本营,不能不驻扎在吾人心灵的体会上。所以中国古时“医者意也”的一句话,鄙人以为是至理名言。……中国的医学,是专从心灵的体会上着手,已经积有数千年的经验。……希望有科学知识的人,不要把机械的试验,看得太重;把心灵的体会,看得太轻。世界上的科学,除了物质方面以外,凡是精神科学社会科学,都不是全靠着机械的试验,才能成立呢”,“希望明白科学的,不要作“科学万能”的迷想。世界事物,在现世科学的范围以内者,不过一部分。科学家的责任,在把科学的范围扩大起来。……现在学西医的,或是学中医的,应该把中国的医学,可以用科学说明的,就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归纳到科学的范围以内;不能用科学说明的,从“君子盖阙”之义,留着将来研究。不但中国的医学,应该这样办法,就是别的学问也应该这样办

法。”^[3]

11月,《学艺》杂志第 2卷第 8号,第 9号连载杜亚泉的《有机化学命名之讨论》一文。

是年,继母去世。

1922年

49岁。秋,其叔海生邀同登泰山,游曲阜。

1923年

50岁。10月,杜亚泉、杜就田、吴德亮、凌昌焕、许家庆编著的《动物学大辞典》由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出版发行。该书是杜氏 1917年开始编撰,耗时 6年,共 250余万字。胡愈之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誉之为“科学界空前之巨著”^[4]

同年,杜亚泉的著作《辛亥革命史》、《帝制运动始末记》、《甘地主义》、《东西文化批评》,合著《欧战发生史》、《大战杂话》、《俄国大革命纪略》,译著《社会主义精髓》、《处世哲学》,合译《战争哲学》、《事物与卫生》被收入商务印书馆刊发的《东方文库》。

致信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董事会,以健康之由婉拒同乡会学校董事之聘,并随即推荐杜辉孙、章锡琛两人。

1924年

51岁,在上海创设新中华中学(又名新中华学院),亲自任教,并将稿费收入捐赠给学校。杜氏多次办学,但其最初的想法是兴办大学进行高等教育,这在他与张梓生的谈话中可见一斑。他们曾经深刻讨论过中国的教育问题,对此杜氏感慨言:“兴学之始,本人主先从大学高师入手,培养领袖及中学教师人材,再办中学及初等师范,以次谋普及国民教育。张菊生(元济)高梦旦(凤谦)等为商馆营业计,急尽力鼓吹小学教育之普及,卒以师资难得,教育遂成病象等等”^[5]。

杜氏一生治学、著书,但是对教育这一理想,却是毕生追求的,从未放弃。他的办学热情从蔡元培、杜山次、章锡琛所作的传记中的回忆可见一斑。蔡元培在《杜亚泉君传》中追忆:“最所热心,则在教育。尝欲自办一校,以栽植社会需要之人才,初拟设于其乡之诸葛山,嗣拟设于绍兴县城之塔山,如何建筑,如何设备,如何进行,如何由中学扩充为大学,每一谈及,兴高采烈,刻日期成,格于情势,未能实现。”^[6]

杜亚泉想自办学校,并将其发展成为大学一事在叔父杜山次为其所作的传略中说得比较详细:“热心教育,尝欲自设一校,以栽植人才,初欲假其乡诸葛山麓之僧寺为校舍,设一中学,尝与朋侪言

及:作何设备,作何设施,如何进行,如何扩张,如何由中学以晋大学,并谓苟得如愿,虽终其身服务于是校,并子侄亦终其身服务于是校,均所不惜。谈至酣畅时,兴高采烈,几欲克日观成,嗣以诸葛山地太偏僻,学生不易招致,拟改设城中塔山山上,向当道乞领官地,而自行募捐建筑校舍,格于情势,不克如愿。然此念蟠伏于中,未尝一日忘也。至民国十三年甲子,乃自设新中华学院于上海,君与其子若侄,均任教课,虽旷去商馆编译之时间,减少薪水,亦不介意。设立两年半,斥资八千余元,无力继续,不得已,乃停办。君原有商馆股本若干,至是悉以出售,犹不足,仍负债二三千元。^[7]

其实,办学不仅仅是他的一个念头或想法,而是愿意为其奉献一生的事业。

杜氏对教育的痴心从未改变过,这一情况在章锡琛的《杜亚泉传略》中也进行了表述,“自创中学于上海,名新中华学院,自任教授训导之责。深恶上海学风之颓靡,力主敦朴。尝谓今日学生之志愿,舍作官外,即为洋奴,欲使己校毕业学生,咸能离去都市,深入乡村,从事教育及农村合作事业。创设凡三年,耗资八千余金,绝不向人募款。君家仅中资,至是尽罄所有。^[8]即使在 1932 年“一·二八”事变住所被日军的炮火炸毁,匆忙回到绍兴,家中已经赤贫,但是还义务担任绍兴稽山中学讲师,每星期从乡下赶往城里,不知疲倦。

1926 年

53 岁,新中华学院因经费见拙无以为继,在创校两年半后被迫停办。虽然杜亚泉倾其所有,乃至抛售其所持商务印书馆股票,但是未能挽回,并负债二三千元。

1927 年

54 岁,2 月,与李石岑(1892—1934)争论新旧伦理,在夏丏尊(1886—1946)主编的《一般》2 卷 2 号上发表《对李石岑先生演讲“旧伦理观与新伦理观”的疑义和感想》。11 月,针对朱孟实(光潜,1897—1986)的《谈情与理》中尊情抑理非理性主义观点,《一般》3 卷 3 号上发表《关于情与理的辩论》予以反驳。

1929 年

56 岁,8 月,杜亚泉的《人生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书作为高级中学教科书,为杜氏晚年倾力之作。这本书最初是由对中学谈论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而成,综合中西各学派,选择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的精要之处,以人的一生发展贯穿始终。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受到知识界的重视。



图 1 晚年杜亚泉

Fig 1 The old Du Ya-quan

蔡元培在《书杜亚泉先生遗事》一文中说:“中学教科之人生哲学,本为旧日伦理学教课之改名,旧日伦理学中,虽亦有关于卫生及养心之说明,然皆甚略。先生此书,说机体生活及精神生活,占全书三分之一,以先生所治者为科学的哲学,与悬想哲学家当然不同也。先生既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执两端而取其中,如唯物与唯心,个人与社会,欧化与国粹,国粹中之汉学与宋学,动机论与功利论,乐天观与厌世观,种种相对的主张,无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长而调和之;于伦理主义取普泛的完成主义,于人生观取改善观,皆其折衷的哲学的见解也。先生之行己与处世,亦可以此推知之。”^[3]而张梓生在《悼杜亚泉先生》一文中回忆:其“曾费年余力,著《人生哲学》一书,搜集各家之说而参以己意,颇为士林所推重。”^[5]

杜亚泉在《人生哲学》的卷首“编辑大意”中对人生哲学作了诠释,即“以生命为万有中心,尤其以人类的生命为万有中心,而创设的哲学。……以生命为万有中心的哲学,亦可称为唯生论的哲学”,“自从这唯生论的哲学即人生哲学创设以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的理论,皆形成一贯。分之各科之学,合之即为一贯之道。且此等各科学中一切学派学说,皆可据唯生论已勘定其价值。”^[9]并且,对其著该书的原因以及过程作了详细的说明,“鄙人以为新哲学成立后,现代纷杂的思想界,将有统整的希望。十八、十九两世纪,为西洋思想界分化的时期;至二十世纪,将入统整的时期。思想的统整,为社会安定的先驱。”^[9]该书 1~4 页中写道:“我们为吸收西洋现代的新潮,整理我国固有的国粹,以统一国民的思想起见,在高级中学校

中,设立人生哲学的科目,诚为必要。鄙人在二三年前,曾一度任中等学校教职,与学生同居宿舍;工作之余,常在宿舍中与青年学生为长时间的谈话。……鄙人因此曾就近人编译书籍中,选其足以开发青年思想者数种,劝学生阅读;又就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科学中,搜辑其新颖警切的理论,每周为学生讲述一次;尤于各科学的名次界说,为学生逐一检查词典,严密注意。惜逾年以后,学校以款拙停止。鄙人乃取搜辑的材料,加以扩充与整理,编为此书,名《人生哲学》。哲学本以统一各科学的知识为职志;现代哲学,尤以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为基础,而应用方面,尤注重于伦理学。是书即撷取上述各科学的精义,而以人生的发展为中心,把此等科学,联成一片,使青年学生,于万有科学中,得约略窥见其根柢。^[9]

是年,杜亚泉已萌生退意,在杜耿孙的《杜亚泉——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中的叙述可以看到,“亚泉自从自办中学失败后,心境不好,在馆内,又因他拟定的某些计划等,遭到王云五或其心腹的阻挠,更快不快^[10]。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杜亚泉在进入商务印书馆25个年头时,提出请辞,但是馆方未允。

1930年

57岁。1月,婉辞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董事一职,其原因在绍兴旅沪同乡会1930年1月的档案可以知道,杜亚泉看到学校教师“无理要挟加薪”,“校风不良”,其本人“不甘为时势所屈服”。

1931年

58岁。与商务印书馆高层的分歧已经比较大,并用其一部分退休金偿还办学时的债务,两次提出请辞,但是馆方出于养老金(若当时杜亚泉退休,馆方需付其退休金1万元)的考虑未允。

1932年

59岁,“一·二八”事变发生,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所毁,杜亚泉在闸北的住所也未能幸免,遂携家眷返乡避难。由于时间仓促,所带无几,以变卖田产艰难维持生计。5月,杜亚泉返回上海,正值商务印书馆撤销编译所,故退休回乡。其与子侄及几位商务印书馆博物部的同仁组织千秋编译社,继续从事著译事业,70余万字的《小学自然科词书》就是在此期间编纂完成的。

所著《化学工艺宝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秋,在乡间抨击豪强,革新教育。每周去绍兴县稽山中学(绍兴二中的前身)义务演讲一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等。

1933年

60岁,1月,所著《下等植物分类学》《高等植物分类学》相继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月28日,在淞沪战争中,杜亚泉的工作场所商务印书馆及在闸北的主所一同被日机炸毁,遂率全家回到家乡,但其历年日记和所有书籍、笔记、书信均损失殆尽。因重建家园,债台高筑。

4月,其著作的《博史》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不同杜氏以往的作品,主要是介绍中外棋牌戏的历史和规则。

6月,杜亚泉、杜就田、吴德亮、凌昌焕、许家庆编著的《植物学大辞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缩本。同月,杜亚泉等的《动物学大辞典》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缩本。

秋,与两个堂侄杜其堡和杜其壺组成的家庭编辑社完成《小学自然科词书》一书。该书收录自然科学词汇2000余条,包括小学自然科学教科书中涉及的必须词汇和补充教师的自然科学知识,有自然科学、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地文学、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生理学、卫生学、工程学、农业、森林、化学工业、制造、建筑、摄影术、游戏、食品等23类。

12月6日,因肋膜炎医治无效,在家乡病逝,享年60周岁。其留有子女7人,4男3女,长子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次子毕业于医科学校,正在实习期,3、4子尚在中学,长女适高,次女待嫁,3女务农,有子女各1人。

后记:杜亚泉逝世后,由于其身后萧然,蔡元培发了讣文,并于1933年12月21日撰写了《为杜亚泉逝世发通函》,为其下葬及遗孤生活求学筹集资金(后馆方代筹集到赙金1000多元)。该函内容如下。

径启者:杜亚泉先生逝世,身后萧然,几于不克棺殓,哲人厄运,闻者伤之。先生提倡科学,远在三十五年以前,埋头著书,亦积有三十五年之久。其编撰之作,整部出版于商务印书馆及零篇散见于各杂志中者,不胜枚举。嘉惠士林,无待赘述。因家本寒素,又不善积蓄,重以沪上“一·二八”之变,商务印书馆遭焚,职员均受损失;先生间道避难,损失尤大,以致影响生计,此其老而弥困之情形也。遗孤中,尚有二人在中学时代,一女未嫁,此后支持,大非易事。凡我友朋,宜加存恤。倘赐礼物,希用现款,庶几积有成数,为偿还医药及举行薄葬之用;有余以备诸孤求学之资。仁者所施,实利赖

之。谨为声请,诸维察照。

同时,杜氏的故交挚友等纷纷撰文悼念和追忆这位为中国科技知识传播及教育普及做出杰出贡献的教育家。其中,有蔡元培的《杜亚泉君传》、《书杜亚泉先生遗书》,张元济代表《东方杂志》编辑部所撰的《杜亚泉先生诔辞》,胡愈之的《追悼杜亚泉先生》,章锡琛的《杜亚泉传略》,张梓生的《悼杜亚泉先生》,周建人的《忆杜亚泉先生》等。

1934年1月,蔡元培等12人发布《为杜亚泉先生募集子女教养基金启》,内容如下:

旧同事杜亚泉先生不幸于上年十二月六日在籍病故。念先生服务商务印书馆,垂三十年,遭国难后,始退休归里,然犹任馆外编辑,至弥留前不辍,可谓老且勤矣。今闻溘逝,身后萧条,尚赖其族戚亲友为之经纪其丧,文士厄穷,思之可慨。顾其夫人亦老而多病,稚女未嫁,二子在中学肄业。同人等久契同舟,感深气类,悯其子女孤零,不可使之失学。因念先生遗风宛在,旧雨甚多,或以桑梓而悉其平生,或以文学而钦其行谊,必有同声悼惜,乐与扶持。为此竭其微忱,代申小启,伏希慨解仁囊,广呼将伯,集有成数,即当储为基金,使其二子一女,皆可努力读书,克承先业,则拜赐无既,而先生亦必衔感于九泉之下也。

其著作仍有出版者。惠利惠撰,杜亚泉等译的《动物学精义》,1939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杜亚泉、杜其堡、杜其尧所著的《小学自然科词书》90万字,1934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4月再版。

参考文献:

- [1] 蔡元培. 植物学大辞典·序二 [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
- [2] 祈天锡. 植物学大辞典·序三 [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
- [3] 杜亚泉. 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 [J]. 学艺,1920,2(8).
- [4] 东方杂志编辑部(胡愈之). 追悼杜亚泉先生 [J]. 东方杂志,1934,31(1).
- [5] 张梓生. 悼杜亚泉先生 [J]. 新社会,1934,6(2).
- [6] 蔡元培. 杜亚泉君传. 见:绍兴县志资料,第1辑.第2编.第16册.绍兴:绍兴修志委员会,1937.
- [7] 蔡元培. 书杜亚泉先生遗事 [C]. 许纪霖,田建业. 一溪集.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8] 章锡琛. 杜亚泉传略 [C]. 许纪霖,田建业. 一溪集.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9] 杜亚泉. 人生哲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 [10] 杜耿荪. 杜亚泉. 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期的自然科学编辑. 绍兴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3

(编辑 徐象平)

Biographical chronology of Du Ya-quan from 1912 to 1933

CHEN Yi-wen, KANG Xiao-yu, YAO Yuan

(Center for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Northwest University, Xi 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Aim** To demonstrate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Mr Du Ya-quan in natur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the time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Methods** Literature analyzing and researching were used. **Results** Two journals were published and Ya Quan school, Pu Tong school were founded by Du from 1898—1933, and he taught at Zhongxi School, Xunxi School, Yuejun School, New China School. At the same time, Du had published 320 pieces of articles and edited about 40 books. **Conclusion** Du was a representative person who introduced and spread western natural science in China, and his thought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had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 Du Ya-quan; western natural science; education